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XIESHANG
MINZHU
ZAIZHONGGUO

协商民主 在中国

李君如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014039302

D621
98

协商民主 在中国

XIESHANG
MINZHU
ZAIZHONGGUO

李君如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D624
98



北航

C1726749

责任编辑:陈光耀

装帧设计:胡欣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协商民主在中国/李君如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3

ISBN 978-7-01-013345-4

I. ①协… II. ①李… III. ①民主协调-研究-中国 IV. ①D6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55061 号

协商民主在中国

XIESHANG MINZHU ZAI ZHONGGUO

李君如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1.25

字数:139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13345-4 定价:3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言：与其空谈民主不如深入 研究民主的实践经验

谁都知道，用民主取代专制、集权，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讲，在要不要民主的问题上，早已形成共识，现在要进一步讨论的是：实行什么样的民主，更有利于中国的持续健康发展。

应该讲，我们今天已经有条件进行这样的讨论了。因为，中国是从“文化大革命”走出来后，步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对于民主有着特别的期待。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把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民主，健全法制，作为这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实现现代化为目标的新的革命的一项重大任务。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们为此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努力，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以及“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在这个问题上的正反两方面经验，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是我们今天讨论民主问题的重要基础。

记得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曾经说过一句名言：“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① 我国民主政治的实践也证明，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民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讨论社会主

^①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99 页。

义民主了。也就是说，在今天，空谈民主不如深入研究民主实践的经验，包括正反两方面经验。

提出这个问题，并非只重视经验而忽略理论，而是要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理论。熟悉世界民主理论的人都知道，当今世界并没有统一的民主理论，自由主义有自由主义的民主理论，保守主义有保守主义的民主理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而且，媒体上充斥着的那些万花筒般的民主鼓噪，比严肃的学者的观点影响更大。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尽管引起这些事变的原因各不一样、结果也各不相同，尽管那些国家的人民在这些事变中并非都享受到了民主的权利，成为国家的主人，但在许多媒体的报道和学者的著述中都被戴上“民主”的桂冠。这样，在民主成为一种时髦的同时，也在一些国家成为许多人付出极大代价而只有少数人才能享受到的奢侈品。这些情况，应该引起我们思考。一个思维健全的人，一个成熟的国家，不能简单地照抄人家的做法，不能盲目地跟风转，而应该在认真研究自己国家国情的基础上探索能够让本国人民真正享受到的民主。

提出这个问题，还因为民主理论非常深刻和复杂，并非简单地望文生义就可以了解和掌握。因为，“民主”的词义虽然在词汇上就可以一目了然地了解，但要搞清楚其内涵却是让多少学者伤透脑筋的问题。美国学者乔万尼·萨托利和他之前的许多学者都讨论过“什么叫民主”这个极其复杂的基础性问题。

乔万尼·萨托利讲：“民主的词源学定义很简单，民主即人民的统治或权力。”但是再深究一下，什么叫“民”，什么叫“主”，就复杂化了。“民”可以是每一个人，可以是许多人，可以是社会较底层的人，可以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等等；“民”与“主”结合起来，可以是每一个人的统治或权力，可以是多数人的统治或权力，可以是社会底层

人的统治或权力，可以是整体的人的统治或权力，等等。“当我们面对人民的概念与权力的概念之间的关系、‘民’和‘主’的关系时，困难便增加了，事实上，它们成了词源学方法无法克服的困难。”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像卢梭那样聪明的思想家提出“用没有代表的选举原则代替不经选举的代表”。于是，难题迎刃而解，政治家、学者皆大欢喜。

但是在选举中，新的问题又发生了，由于选举只能实行“有限的多数原则”，即我们都熟悉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于是“人民的统治或权力”就转化为“多数人的统治或权力”。然而，什么叫“权力”？什么叫“统治”？“权力是针对某些人而行使，统治要以被统治者为前提。人民的权力是针对谁呢？谁是人民主权的承受者和对象呢？因此这句话完整地写出来就成了：民主是人民对人民的权力。但这样一来便使问题完全走了样。”^①对这么一个基础性问题的讨论，世界上百家争鸣，还有很多很多，并且还在继续着。

介绍这些情况，并非是说民主有问题，仅仅是希望人们从关于民主问题的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理解中解放出来，在研究世界各国各家各派民主理论的同时，更重视我们自己的民主实践及其经验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我作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周抗的助手，参加了他承担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重点项目“社会主义民主论”的研究。周抗是从延安抗大走出来的哲学家，十分重视在实践中研究哲学和改革开放的重大理论问题。他在要求我们广泛了解世界民主理论各种观点的同时，还要求我们收集党史资料，研究我们党在民主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并且亲自带领我们去浙江诸暨农村、四川

^① 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43页。

成都和重庆企业进行实地调研，了解改革开放过程中农村民主和企业民主的新鲜经验。这次民主实践的调研，使我对中国的国情特别是工人、农民的民主要求有了直接的深切的了解。后来在我们的研究成果中，强调民主虽然是上层建筑，但它不但要同经济基础相适应，还要同决定生产关系的生产力的实际状况相适应；民主的本质是有层次性的，并不单纯是国家形态，维护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集团内部的平等关系是其更为深刻的本质；民主制度、民主权利、民主作风三者的统一是社会主义民主本质的反映，基层群众既要求建立和完善民主制度，更期盼自己享有民主权利、干部要有民主作风。与此同时，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时，我们也注意到了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程序，实行的是民主协商与多数决相结合的原则；人民政协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协结合起来能够更好地反映各个方面人民群众的意见；等等。这些以往教科书没有的观点，都是从实践中获得的。当然，当年我们还处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研究和探索也是初步的。

后来，我在跟踪研究浙江椒江的党代会常任制试点经验时，了解到和椒江同属台州市的温岭建立的村民“民主恳谈会”很受群众欢迎，就到那里去调研。我注意到，椒江的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属于党内民主，温岭的“民主恳谈会”属于人民民主；椒江的党代会常任制完善的是选举民主，温岭的“民主恳谈会”实行的是协商民主。这些在基层群众的实践中创造的民主形式，不仅有效果，受欢迎，而且是书本上没有的，实在太令人兴奋了。2006年，中共台州市委组织部编写了一本书，题目是《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36法》，介绍了那里的人民群众创造的36种基层民主的具体做法。在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之前，他们希望我写一篇序言，我欣然答应了。我在序言中写了这样几句话：

“这本书介绍了台州市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但又不同于一般的经验介绍，而是把简明的提示、生动的案例和总结性的点评结合起来，具有一定的理论性、生动性和鲜明性。显而易见，这是一本理论联系实践的、对于加强农村基层党的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很有用的好书。”

“那么，这本书在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哪些经验呢？这个问题要靠大家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自己去体会，别人是无法替代的。在我看来，至少有这样几条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一是把加强党的领导与加强民主政治建设辩证地统一了起来，解决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问题上的一个难题；二是坚持以党内民主来带动村民自治，在民主问题上显示了党的先进性；三是把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这两种民主形式很好地结合起来，保障和维护了公民的民主权利；四是坚持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完善了民主集中制及其操作机制和方法。对于这些经验及其做法，人们也许可以发现其中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是对于一个长期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来说，这些来自实践的经验，应该是非常宝贵的。我们连来自外国的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都借鉴，对于自己创造的民主政治经验应该更重视才好。”^①

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的经历，对于我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和条件。当上政协委员后，在第一次小组讨论时，我说了一段话：“过去，我是从政协外面研究政协，现在可以从政协里面来研究政协了。因此，我对自己提出了一个任务，不仅要履行好政协委员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而且要履行一

^① 中共台州市委组织部编：《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36 法》，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2 页。

个理论工作者的职能，研究政协本身，研究这种民主形式。”过去，人们对政协有许多议论，认为这是一个政治摆设，因为人是你选来的，议题是你定的，怎么会有民主呢？当了政协委员后，我发现许多老政协委员，比如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瞿世镜委员，不仅敢说话，来参加会议前先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准备了上会要提的提案和建议，而且会议气氛非常好，允许大家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们的一些老部长，不仅有丰富的经验，能够提出许多利国利民的真知灼见，而且特别敢说话，敢提不同意见。这引起我极大的兴趣：为什么政协里面的民主气氛那样好呢？经过仔细观察和研究，我感到主要是政协的结构、机制和功能比较好。尽管政协在鼓励和支持委员对党和政府的民主监督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还要加强和改进，但它确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实现形式。这种形式，扩大了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同世界上正在研究的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有许多类似之处，而国外对这个问题还处在研究讨论阶段，我们却已经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应该深入研究和宣传。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一方面建议政协领导组织和推动这方面研究，另一方面在《北京日报》、《文汇报》发表了一些研究文章和访谈，并在一些重要的场合包括在国际研讨会上具体介绍我们的政协和它所实行的协商民主。我的体会就是：如果你要真的推进中国的民主政治，就应该脚踏实地地研究我们自己的民主政治实践及其创造的无比丰富的经验。

为了写这本书，我在《北京日报》2005年9月26日网络版上找到了那时发表的文章，题目是：《中国能够实行什么样的民主》。重温这篇文章，别有一样感觉。这篇文章的主体部分是这样写的：

如果对世界上各种民主形式加以具体研究的话，我们可以看

到，基本的形式可以分为三类：一是选举民主，这是西方一些政治家和学者同我们讨论得最多的一种民主形式，其特点是通过公正的投票并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按照多数参选人的利益要求形成决议、法律或选出治理国家的人选及其政党；二是谈判民主，这是国际政治和世界许多国家的政治生活中都常见的一种民主形式，其特点是通过谈判分配利益，以使各方都能对自己的利益要求得到相对满足；三是协商民主，其特点是在全社会范围内由公民平等地参与公共政策的决策，通过广泛的讨论和对话，形成共识或找到最大的共同点即共同利益，做出具有集体约束力的决策。

我们注意到，协商民主是西方政治学界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兴起的一种民主理论。这种理论的兴起，是对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及其缺陷的回应，是为了弥补选举民主及其多数决原则的不足。因为，根据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实行的选举民主，对于大多数没有金钱实力的公民来讲只有投票上的平等，而没有参与集体决策的平等；选举民主对于多元社会中广泛而深刻地存在的道德争端，常常也显得无能为力。而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的决策体制或理性的决策形式，每个公民都能平等地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并倾听别人的观点，包括对道德问题提供协商的空间，在理性的讨论和协商中做出大家都能接受的决策。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已经开始注意西方对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批评和在协商民主理论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大家谈得较多的是哈贝马斯的观点以及其他西方学者的主张。进行这样的研究和借鉴，显然是必要的。但是，也应该看到，我们实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立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强调的就是进行“政治协商”，就是协商民主的一种形式。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党派之间实行协商民主的一种制度安排。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不同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它不是代议制的上院（参议院）这样的国家权力机构，也不是政府这样的国家机关，而是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和各界别的代表，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归国侨胞的代表以及特别邀请人士组成的中国人民统一战线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显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虽然不是全体公民都能参与的协商民主，但它又是由一批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公民组织和公民直接地平等地参与的协商民主。可以这样说，这是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长期实践，有力地证明了：实行这样的协商民主，不仅能够有效地保证政协委员进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而且能把“民主”与“团结”统一起来，实现党派和谐、民族和谐、界别和谐、海内外同（侨）胞和谐，进一步促进了社会整合。也就是说，在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发展的形势下，尤其是在我国社会已经或正在向多样化、动态化、社会化方向发展，并经受着前所未有的信息化考验的形势下，日益分化的中国社会特别需要在和谐发展中，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新的整合。

我们这几年的实践已经明确了，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要达到这样的要求，我们可以考虑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把选举民主、谈判民主和协商民主这三种形式有机地结合起来，更多地发挥协商民主的作用。

第一，应该进一步完善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

形成党内的协商民主机制，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能力，发挥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作用。

第二，应该进一步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作用，在政协内部（适当时候也可以在政协外部）通过执政党主持的协商民主，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人事选举和立法内容进行事先协商。

第三，应该进一步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由公民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民主协商中形成的建议，进行审议、选择和表决，并由人民代表大会对法律的实施和执行情况进行有效监督。

形成这样具有鲜明的民主法治特征的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就能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自觉地维护安定团结，就能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在社会和谐发展中，群策群力，万众一心，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实事求是地讲，介绍国外协商民主理论研究方面的工作，早已有人在做。我之所以要把2005年发表的这篇文章找出来，是因为这篇文章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标志。^①在这之前，我对协商民主的关心，同国内许

^① 这篇文章发表之前，在2005年7月我曾建议中央领导：在民主政治问题上，国内外议论很多。我们以往的做法，对于来自方方面面提出的此类问题，要么是避而不答，要么是讲一些空洞的大道理（比如社会主义民主在本质上要比资本主义民主广泛和优越），等等。在回答来自国内外的挑战中显得相当被动。出现这样的局面，有各种复杂的原因。其中之一，是我们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许多人的头脑里有一个参照物，即美国式的选举民主。因此，要回答好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的各种挑战，要深化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个思想“参照物”。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两条：一是分析美国式选举民主的利弊得失；二是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我国的民主制度是“选举+协商”的民主制度，有其独特的优点。因此，建议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发挥人民政协在协商民主方面的优越性，为促进社会和谐做贡献。

多学者一样主要做的是理论研究方面的工作。从这篇文章开始，我的努力方向不再是一般地谈论协商民主理论，而是以人民政协的实践为重点深入开展中国协商民主经验和理论研究，使更多的人特别是领导层了解这个理论和这些经验，把“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作为一个研究中国民主理论的范式，推进中国的民主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为此，我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多次在大会发言中建议要充分重视人民政协的经验，充分认识人民政协实行的协商民主的地位和贡献。2006年3月10日，我在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作了题为《协商民主是重要的民主形式》的大会发言，阐述了我国的民主制度是“选举+协商”的民主制度，它有其独特的优点。2008年3月9日，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我又作了题为《人民政协在民主建设中大有可为》的发言：

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起步，并且紧密结合经济体制改革扎扎实实地推进，从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开始到现在，已经取得了不菲的成就。近年来，政治体制改革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这种现象，不难理解。政治体制是我们整个制度的核心。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也必然日益尖锐地摆到我们的面前。

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比经济体制改革更为复杂、更为艰巨的系统工程。推进这项工程，有两点是必须注意的：

一是要明确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为了什么。我们不管实行哪一种民主制度或民主形式，都必须有利于人民权益的实现和富裕幸福，有利于社会充满生机活力和安定有序，有利于民族团结和睦

和国家统一昌盛。凡是不利于这一民主政治终极目的的政治行为或民主形式，不管它有多么动听的名词，进行多么富有诱惑力的宣传，都不能轻信和照搬。

二是要研究和寻找符合中国实际的民主政治实现形式。中国的民主政治要发展，既要学习借鉴国外一些先进和有益的成果，更要从实际出发，不断探索，进行理论创新，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实践创新。我们致力探索的，应该是、也只能是符合中国的历史和今天国情的，能够真正给中国人民带来安定和幸福的民主形式。这是一个不可更移的立场。

在这里，我一再提到“民主形式”这个词。有些人问我：你为什么不谈民主的内容和实质，而老谈民主形式？我不是不谈民主的内容和实质，而是多年来以讨论民主的内容和实质为名已经讲了那么多的套话大话空话，应该换一换思路了。哲学家常常说，要使事物发展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必须找到同事物的内容相适应的形式。在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我们能否也务实一点，认真地思考和研究一下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形成真正有用的民主政治的体制和机制呢？

我们应该注意到，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实践中建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就其民主形式而言，正是“选举（票决）+协商”两种形式构成的。正如2006年2月8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所指出的：“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我当了五年政协委员，作为一名学者，我一边履行委员的职责，一边观察和研究政协的运作过程及其机制，并且比

较了中国其他的民主政治机构的运作机制，我深深地感到我们的人民政协制度具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在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中大有可为。过去，我们总认为政治协商会议制度既不是西方的上院，也不是政党组织，有点不伦不类。其实，我们的人民政协集中了中国各个政党、各个人民团体、各个民族、各个界别的许多精英。他们的不少提案和报告，不仅敢说真话，切中时弊，而且有真知灼见，对执政党和政府治国理政有很大帮助。说实在话，这种制度一旦用好了，对于人类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近年来西方政治学界兴起了“协商民主”理论的研究热潮，其重要原因在于，以往以选举（票决）民主为核心的传统西方民主理论，已经不能满足今天人们日益增长的民主诉求。在民主化潮流的激荡下，人们希望在政府决策、政府施政、政府监督、社会治理等各个环节上都有更多的参与权。我们应该重视并跟踪他们对协商民主理论研究的成果。与此同时，我们要看到，我们的政治协商制度与西方的“协商民主”有很多相似之处。严格地说，是西方的“协商民主”与我们的政治协商制度有很多相似之处。之所以要这样倒过来说，是因为我们的政治协商制度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而西方的“协商民主”还刚刚处在理论研究和局部实践阶段。所以我说过一句话，在民主政治的问题上，我们既要向人家学习，但也不能妄自菲薄。

我们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应该继承我们前辈的光荣传统，为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出我们新的贡献。我们完全能够创造出对人类有更大贡献的民主的好形式。

除了在全国政协开会的时候，我积极推进协商民主理论和中国经验

的研究宣传，而且在其他场合包括国际会议上也致力于把中国的民主实践经验和我们的民主理论传播开去。我想，这是中国的理论工作者应该做的事。我们中国的理论工作者要有宽广的世界眼光，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的进步成果为我所用，同时，我们更应该重视自己的实践、自己的经验，通过对我们自己经验的研究和理论概括，为人类文明增添中国人的思想财富和政治智慧。

让人们感到十分高兴的是，党中央十分重视我国自己的民主实践，十分重视我们自己在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实践中积累的经验。事实上，党中央早已在2005年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并在2006年“两会”开会前的2月8日颁布实施。这个文件，就是中共中央（2006）5号文件。在这个文件中，正式提出了“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①这一文件对于中国民主政治的意义，随着历史的演进将会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

光明日报在2007年“两会”开幕前夕，曾经发表过一篇题为《2006年政协新话语：协商民主》的综述，指出：“人民政协，已经走过了57年路程，积累了57年经验。2006年，在人民政协发展的历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一年，在人民政协的成套话语中，‘协商民主’这一新话语闪亮登场，人民政协的民主功能突兀显示出来。”“‘两会’闭幕后，协商民主理论研究并没有同时谢幕。从全国政协到地方政协，政协委员开始了对协商民主的深入研究，理论界也行动起来

^① 这个论断，最初是江泽民1991年3月23日在参加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全国政协七届四次会议的党员负责同志会议上讲话中提出的。2006年，这一论断写进了党中央的正式文件。

了。于是，‘协商民主’从政协新话语，成为中国政治新话语。”

这篇综述还介绍说：

翻开全国和地方人民政协的 2006 年工作日历，我们可以发现，协商民主理论一经提出，就迅速地转化为人民政协的实践。

在全国政协提案工作座谈会上，大家从完善协商民主的角度，提出要加强政协的民主协商功能。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忠禹在会议闭幕时所作的重要讲话中也指出：“提案工作作为人民政协的一项全局性工作，必须不断加强和改进。一是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提高提案工作整体质量。二是要进一步增强协商意识，在提案工作中发扬我国独具特色的协商民主。三是要进一步增强全局意识，努力增强提案工作的合力。四是要进一步增强创新意识，努力增添提案工作的活力。”

上海市政协已初步探索建立了多层次、多种形式、各有侧重的“协商民主”格局。在政协全会上，全体委员带着各界各方的重托，就本地重大决策、社会热点和难点问题等重大事项，与市党政领导人面对面地交流协商，提建议，献良策。去年上海有关部门在研究制订“出租汽车运价油价联动机制”方案时，参与讨论的政协委员着重提出：方案不能仅让职工和消费者承受油价上涨的负担，而要真正体现企业和职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联动”机制。政府部门据此修改草案后再次征求了政协意见。多次民主协商使方案更加完善，实施后社会反响平稳。这个“联动机制”方案的出台，成为人民政协积极组织政治协商、参与城市决策管理的生动事例之一。去年，上海市政协共召开 14 次专题议政会，对正在修订或即将出台的公共政策开展民主协商，包括“增加养老金及